

身份建构逻辑与群体性 差异的表征*

——基于巴黎东北新移民的实证调查

赵晔琴

提要:近些年,移民的身份问题受到来自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普遍关注。作为一种边缘社群,与其他群体相比,移民的身份问题更为突出。1990年代末以来进入法国社会的东北人群体已成为温州人之外的又一个华人移民显群,这一群体的形成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城市下岗工人为主,大都是非法移民。本研究试图从移民认识和解读自我的迁移经历及身份认同出发,探讨法国东北新移民的群体边界的建构和生产过程,在此基础上理解90年代末以来中国转型社会背后的集体性焦虑。

关键词:法国 东北移民 身份认同 社会建构 结构化差异

2007年12月13日的《南方周末》有一个触目惊心的标题:“非法移民刘春兰之死”。

谁是刘春兰?

刘春兰,辽宁抚顺人。1995年,刘春兰从抚顺市服装二厂下岗。下岗后,她替缝纫店做过针线活,也干过类似护理老人、饭店洗碗的工作。丈夫张百良是抚顺木器厂的职工,曾经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先进工作者”,2003年因为厂子效益不好,下岗了。儿子张宇斌自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直到25岁还没谈过对象。2004年10月,48岁的刘春兰怀揣着一本旅游护照,带着7万元钱的债务,只身远走法国巴黎。她此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给儿子一个体面的婚礼……2007年9月20日,为了躲避警察,她从地铁站沿拉维烈特大道向北5分钟路程内的一栋五层临街住宅跳下,意外身亡。2007年11月17日,刘春兰的骨灰

*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CMC)Florence Lévy博士的多次交流,特此感谢。同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被装在一个蓝色袋子蒙着的罐子里从巴黎启程回国。两天后,在辽宁抚顺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中,骨灰回到家乡,并最终入葬城郊的金山息园公墓……刘春兰之死,成为法国最具轰动效应的新闻之一(参见孟登科等,2007)。

在法国的华人新移民^①中,“东北人”是近些年较为突出的一个群体。2000年5月,法国“语言文化辅导协会”(ASLC)会长马克·保罗(Marc Paul)^②在参加关于欧洲中国新移民问题研讨会时,向会议提交了《东北人:巴黎的中国新移民》一文,第一次在学术会议上正式提出“巴黎的东北人”问题。此后,法国中、法文媒体相继报道“巴黎街头出现中国大陆卖淫女”,并指出这是一批来自中国东北的“下岗女工”,在法国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参见李明欢,2008;刘芳,2002;Fabre & Guibert, 2003)^③。而后,法国学术界对华人移民的研究也开始转向“东北人”问题(Cattelain et al., 2005; Lévy & Lieber, 2008, 2011; Lévy, 2005, 2012)。与此同时,东北新移民这一地域群体也开始在海外华人移民中初露头角。2006年,日本学者王维与香港学者钱江共同发表了美国旧金山湾区《中国东北新移民》的调查报告,他们指出,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东北新移民已开始成为当代中国国际移民潮的主要成员之一,其中既有经济层面的原因,也有中国社会内部体制变迁的深层因素(王维、钱江,2006)。

国内对于法国华人移民的研究,基本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绝大部分集中于史学研究领域(叶星球,1998;杜莉,1998;邢树森,1999;文晏,2004;金华,2004),而对于法国华人新移民的经验研究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是王春光对巴黎温州新移民的“跨社会建构”问题的讨论(王春光、Béja, 1999;王春光,2000a, 2000b)、李明欢对侨乡移民的研究(李明欢,2008)等等。除此之外,对于90年代后进入法国社

-
- ① “新移民”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华人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指改革开放以来进行国际迁移的中国大陆人口。之后,国内外媒体开始使用这一概念。但是,“新移民”概念引起了较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争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 时间界限,2. 地域范围,3. 身份构成等等(张秀明,2001)。
 - ② 保罗先生于1996年发起成立法国“语言文化辅导协会”。该会的宗旨是向以中国人为主的巴黎新移民提供学习法语、了解法国生活环境的服务。
 - ③ 2006年1月,法国电视1台(TF1)播放了纪录片“巴黎地区的华人非法作坊”。同年5月,法国电视2台(TF2)拍摄了纪录片“美丽城里的流莺”,专门讲述了来自中国东北的站街女的情形,这些报道在法国社会、甚至在中国社会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会的东北新移民群体则缺乏足够的关注,除了媒体的部分报道外(参见赵晔琴,2006;孟登科等,2007),目前为止能够真正进入社会学领域的经验研究并不多见。然而,这股“东北风”^①却势不可挡,从其数量、规模来看,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华人已经成为继温州、福建之外的第三大地域群体(李明欢,2008)

巴黎缘何刮起“东北风”?与温州移民相比,东北新移民群体有什么特殊性?这种结构性的群体差异是如何建构和生产其群体边界的?我们试图通过对东北及温州移民的生活史访谈,探析东北新移民与温州移民之间的群体身份区隔,以及这种群体性差异在法国社会中被建构及结构化的过程。

一、导 论

(一)集体身份的获得:社会建构与身份认同

关于身份的研究是现代语境中文化研究领域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和移民潮涌动的现代社会,由于个体和群体的特质在与其他人或群体空前的互动中正面临着变动、迷乱、离解,甚至是消失,身份问题显得尤为紧迫,身份问题研究成为文化研究中的显学(覃明兴,2005)。什么是身份?从一般意义上讲,身份泛指人的出身、地位、资格,是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从理论意义上讲,身份是社会研究的基本单位,同类别、角色、地位等概念相联系,是社会成员的社会属性标识和社会分工的标识。

在探讨某个社会群体的集体身份时,社会建构和身份认同经常被看成是一对有意义的分析路径(赵晔琴,2007)。“社会建构”一词最早是由贝克和卢曼在他们的著作《现实的社会建构》(Berger & Luckmann, 1966)中提出的,他们的研究致力于探索社会现实与社会现象被建构或被创造的方式,把制度化过程看成一种习惯性行为的类型化(typification),并且认为,如果创造制度的个体可以将其置于自己的

① 1990年代中期开始,以沈阳为主的大批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移民开始逐渐在美国旧金山湾区聚居。由于人数众多且集中,这拨来自东北的新移民已日渐成为当代华人社会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当地华文媒体形象地称之为“东北风”。

行动中,那么,其后代也就会将这个被创造的制度看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这里,现实的社会建构无疑被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所谓的“现实”是人们根据自己的解释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认知行为再生产出来的。“社会建构”正是被用来解释社会的主客观纬度之间以及个体与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方法。在贝克和卢曼之后,“社会建构”这一概念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被用于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①

在相关研究中,身份建构包括主观和客观的两重性,既需要群体自身对自己身份的主观认同,也需要外在于群体的客观的社会性建构。有关身份建构的研究认为,身份是一种建构的过程,是在演变中持续并在持续中演变的过程(钱超英,2000)。同时,这种身份建构过程,又是一个从一般性(universality)到特殊类别(category)的过程(Somers & Gibson,1994)。贝克和卢曼(Berger & Luckmann,1966)在对现实社会建构的研究中指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要素,如语言、行为等都有助于对现实的社会建构做出辩证性的描述,这种描述验证了诸如马克思·韦伯(社会事实有主观意识)、涂尔干(社会事实)和卡尔·马克思(人类生产了他被生产的世界)等人的观点。由此可见,在制度性的建构之外,日常生活世界也是身份建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基于身份与认同的建构性、过程性特质,有关认同的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转向。有学者提出,认同是社会背景中一个不可被剥离的过程,应该从结构性的视角介入对社会认同的研究(李友梅等,2007)。

近些年,移民的身份问题受到了来自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普遍关注。作为一种边缘社群,与其他群体相比,移民的身份问题更为突出。有学者认为,物理空间的迁移给移民带来了身份危机和身份焦虑感。通过语言的情境性运用、建立移民社团、对地方风俗和社区历史进行诠释,以及移民社会运动等身份磋商策略,移民不断建构新的身份,以获得在异地他乡的生存意义,最终解决“我是谁”这一根本性问题(覃明兴,2005)。我们的研究试图分析巴黎东北新移民的集体身份是如何通过社会建构和自身社会认同的作用被建构起来的,以及这种有别于温州移民的群体性特征是如何在法国社会中被结构化的。

^①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2008)是社会建构论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代表作。

(二) 研究对象的界定及田野进场

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 1990 年代中后期以来进入法国社会的中国东北新移民。法国华人习惯于将来自辽宁、山东、天津、吉林、黑龙江等地操“北方话”的新移民统称为“东北人”，以区别于传统侨乡来的温州移民和福建移民。我们的调查也发现，以“东北人”为主的北方移民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他们大都来自一些传统的工业基地，90 年代中后期因为国企改革成了下岗工人。因此，本研究的调查对象除了地理意义上的“东北人”之外，还包括了其他北方城市的北方人，并沿用法国华人的习惯，统称其为“东北人”。

本研究的资料主要来自于 2006 年 1—6 月间在巴黎进行的田野调查。期间，笔者利用在位于巴黎三区的瓯江中法协会做义工的身份进行田野调查，接触来协会进行法律咨询的华人新移民，对他们在协会的活动进行参与式观察，同时也做了大量的现场交谈。^① 深入访谈的对象基本上是通过“滚雪球”的方法累积的。具体来讲，就是随机选择一些被访者并对其实施访问，再请他们提供另外一些属于所研究目标总体的调查对象，根据所形成的线索选择此后的调查对象。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符合条件的受访者。但是，由于大部分华人新移民是非法移民，所以拒访情况时有发生。^②

最终，有 15 位华人移民接受了比较正式的访谈。他们中女性 12 人，男性 3 人。来自浙江温州和青田^③地区的有 8 人，年龄在 18—38 岁之间，其余 7 人分别来自沈阳、山东、北京等北方城市，年龄在 40—52 岁之间。他们在巴黎逗留的时间长短不一，最短的才 5 个月，最长的 10 多年。他们中绝大部分没有“纸张”——即长期居住证，靠在中餐馆

① 瓯江中法协会 (Association Pierre Ducerf) 始建于 1993 年，致力于为华人融入法国社会和中法文化交流提供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服务。笔者于 2006 年 1 月开始在协会做义工，主要包括每周六上午免费教授法国人中文、参与协会组织的中国文化活动等。为了进行社区观察，笔者经常往来于巴黎三区、十三区和十九区这些华人移民集中的社区。

② Lisa 和 Nina 是笔者在巴黎调查过程中遇到的两位华人新移民，她们不愿意透露自己的中国姓名，也拒绝接受我的访谈。Nina 是我在瓯江协会教授中文课时认识的。中文课上有个 50 岁开外的法国学生，听说我对华人移民感兴趣，就主动把他的妻子 Nina 介绍给我。Nina 是典型的新移民，40 岁出头，来法 4 年。不过，她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谈话。而从那之后，她的丈夫也不再来参加周末的中文课了。Lisa 来自山东青岛，离了婚带着女儿来到法国，嫁给一个年长的法国人。我经人介绍得到了 Lisa 的联系方式，随后通过几次电话，但她最终不肯见面接受访谈。

③ 青田原隶属于温州，作为“华侨之乡”，青田有 300 多年华侨史，是浙南地区有华侨史记载以来最长的华侨史，至今有 18 万青田人分布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和人工场作坊打黑工维持生计,年长的北方女人则更多在老一代温州移民家里做保姆(赵晔琴,2006)。从他们的原有职业来看,在被访的北方移民中,除了一位在国内单位仍保留岗位之外,其余皆为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相比温州移民(农村户口、初中学历)而言,北方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在被访的7位中,6人拥有高中学历,1人有中专学历。他们属于改革前中国城市的中间阶层。根据李强(2004)对中间层代际更替的研究,改革前中国的城市旧中间阶层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主要由类似白领的干部、知识分子、国营企业职工构成;二、主要分布在40-50岁上下的同龄群体中;三、国企下岗是传统中间阶层的集体性衰落。在计划经济年代,城市职工是众人羡慕的对象,拥有国企铁饭碗,具有较高的学历,享有城市户口带来的各种福利保障。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和市场的急剧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城市中间阶层经历了集体性的衰弱,沦为新的城市贫困群体。

笔者在巴黎的访谈实践具体可分为几个场景:一、咖啡馆。咖啡馆是欧洲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际场所。在巴黎街头,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咖啡馆。华人新移民到法国之后,也渐渐习惯把约会地点定在咖啡馆。二、美丽城(Belleville)大街附近公园。美丽城地铁站附近集中居住着大量的华人新移民,因此,我的部分访谈地点就选在离被访者住处不远的公园。大部分北方新移民过着群租的生活,他们叫“搭铺”,通常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因此,他们通常不愿意在住处接待陌生人。此外,由于没有合法身份,他们也不愿意在城里乱走,引起警察的搜查,所以,我在选择访谈地点时基本上以他们的要求为主,尽量接近他们的住处。三、被访者家中。对温州移民的访谈主要在被访者家中。与北方新移民不同,温州移民来巴黎的时间相对较长,大部分人有较稳定的住处和家庭成员。笔者通常以访客的形式直接到他们家中做客,且随后都与他们保持着较好的联系。

二、巴黎的“东北人”:一种社会类别的建构

在中国历史上,“东北人”的建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与中国其他地理大区不同,东北地区的居民对“东北”这一概念的认同感远大

于对省籍的认同,这与该地区的独特历史、风俗习惯及语言的统一有密切关系。现在的中国东北地区狭义上指由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构成的区域,广义上则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东部地区。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开始建成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形成以沈阳附近为核心地带的东北亚最先进的工业基地。1949年以后,由于原有的工业基础和紧邻苏联的关系,许多重工业建设项目也都被安排在东北。作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一五”时期的156个重点项目中58项被安排在东北。东北一度占有中国90%的工业,成为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1990年以来,由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趋显现,东北老工业企业设备和技术老化,竞争力下降,就业矛盾突出,资源性城市主导产业衰退,经济发展步伐相对缓慢,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据沈阳铁西区劳动局的统计数字,2004年铁西区下岗职工累计15万、失业人员5万。75万人口的铁西,成为中国下岗失业者最集中的地带。^①

9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东北人开始选择出国打工。在巴黎,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已经成为继传统侨乡移民(浙江和福建)之外的又一股新的移民潮。根据李明欢对法国“语言文化辅导协会”(ASLC)所提供的包含两万多名巴黎中国新移民的数据库^②的分析,自1999年3月至2004年8月在ASLC登记的两万多华人新移民中,来自辽宁、山东、天津、吉林、黑龙江等地的“东北人”或“北方人”占总人数的21.6%,仅次于来自传统侨乡浙江的移民。从数量上看,来自辽宁的新移民仅次于浙江和福建(见表1)。

根据法国劳动与互助部的统计,在法国的中国移民58%来自浙江,26%来自中国北部。东北移民大部分从中、东欧辗转而来,处于华人群体的最底层,受到浙江移民的歧视(高芸,2004)。随着越来越多的“东北人”通过各种途径移民到巴黎,“巴黎的东北人”在法国社会被建构起来,同时也不断地被污名化。1963年,戈夫曼出版了《污名:对

① 参见:“东北下岗工人生活现状纪实”(http://club.kdnet.net/disppbbs.asp?boardid=1&id=292927)。

② 自1999年3月起,法国“语言文化辅导协会”获得巴黎警察局特许,可以用协会名义为巴黎的“无证”新移民提供“地址担保”。那些尚未获得在巴黎长期居留权的“无证”新移民,凭手上的有效证件(原居地的护照、身份证或有效公证材料等)即可到该会进行注册登记,得到一个“合法地址”,用于与家人通信联络,或向法国的银行、邮政、医疗、移民等相关机构申办各类手续。1999年3月-2004年8月11日,共有约2.7万名华人新移民到该会进行登记。

受损身份的管理》一书。基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研究,戈夫曼考察了多种污名化产生的情境,在这些情境中,个人无法得到全面的社会认可。在他之后,很多研究从不同学科角度关注了污名这一问题。然而,对污名的定义,基本沿用了戈夫曼定义的主要内容。戈夫曼认为污名可能源自许多因素,将人从“完整的平常的人”(a whole and usual person)降级到“沾上污点的被贬低的人”(a tainted and discounted one)(Goffman,1963)。被污名化的人被赋予了某种不光彩的特征。后来有研究者把污名化的过程分解为五个部分:贴标签、原型化处理、地位损失、社会隔离和社会歧视(刘能,2005)。

表 1 1999.3-2004.8 在 ASLC 登记的中国新移民人数
(按所登记的省级划分)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总人数(个)	百分比(%)	
浙江		12038	58.5	
福建		2318	11.3	
辽宁	“东北人”或 “北方人”	2018	9.8	21.6
山东		1210	5.9	
天津		606	2.9	
吉林		468	2.3	
黑龙江		151	.7	
上海		1043	5.1	
其他各省市自治区*		734	3.5	
总计		20586	100.00	

说明:*来自其他省市自治区的新移民人数包括:广西96、广东93、江苏92、河南81、河北70、江西58、四川39、湖南38、北京35、湖北34、安徽27、山西21、新疆10、贵州7、云南7、甘肃5、内蒙古5、海南4、重庆4、青海3、香港3、宁夏1、西藏1(李明欢,2008)。

在被污名化的过程,“巴黎的东北人”被贴上了“站街女”、“妓女”的标签。2000年初,法国媒体报道“巴黎街头出现中国大陆卖淫女”,并指出这是一批来自中国东北的“下岗女工”,在法国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此后,法国中法文媒体持续对巴黎的东北人进行报道。法国电视2台制作了专题纪录片报道“美丽城的中国流莺”。2013年巴黎市政府网站发布了题为“中国妓女的长阵”(La longue marche des

prostituées chinoises)的报道,报道称,这些来自中国东北的妓女,平均年龄在42岁左右、近800名中国妓女经常光顾“荷花巴士”^①、80%的妓女是单独来法国,她们花了700到15000欧元办了签证,她们搭铺的费用在100至150欧元不等。^②除了法国媒体积极参与建构“巴黎东北人”这一华人新移民群体之外,在华人群体内部,“东北人”也是作为另类群体被展现出来,这种群体性的集体排他(collective exclusion)在浙江移民与东北移民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X,女,24岁,浙江青田人,已婚,有2个儿子,大儿子1岁半,小儿子也近3个月。X的丈夫也是浙江青田人,33岁。X是1987年5岁时跟着舅妈一家来到巴黎的。所以,自小在巴黎长大的她如今已经完全适应和融入法国社会的生活。

我们浙江人请保姆都喜欢自己圈子里的人,现在也有很多东北人做保姆的,不过我们不太喜欢。一方面,饮食习惯不同,地域差异。我比较习惯温州阿姨做的饭菜。另一方面,东北人在巴黎名声不太好。经常会听到人家说,某某家的东北保姆偷了主人的钱走了什么的,反正传来传去,都很难听的。(受访者S15-X0606)

W,男,30岁,浙江青田人,已婚,餐馆大厨,儿子刚满6个月。

东北人年纪大,找不到工作。很多人很苦的,还到处领难民饭。东北出来的一般都是下岗的。女的就做妓女,男的抢劫。我们那个时候在美丽城,几个人一间,他们就冲进来抢东西。很多留学生也被抢过,护照啦什么的。(受访者S11-W0605)

即便是来自东北的新移民,他们也这样描述自己的群体。

-
- ① “荷花巴士”(le Lotus Bus),是2004年1月,由非政府组织“世界医生”发起的专门为中国妓女设置的机构,目的是“促进中国妓女的健康”,促进她们自我保护、防御各类性疾病的意识。在“荷花巴士”上,她们可以问诊、谈话、获取安全套等等。
- ② La longue marche des prostituées chinoises ([07/02/2013] http://www.paris.fr/accueil/accueil-paris-fr/la-longue-marche-des-prostituees-chinoises/rub_1_actu_125244_port_24329)。

这里很多中国人都做这个(妓女),做了还不知羞耻。这个赚钱容易啊。价钱很难说,你要是形象好点,年轻点就贵些,有些外国人出手很大方的。人家是笑贫不笑娼,你赚钱回家盖楼我也不羡慕。这些人全国各地都有的。我2000年来的时候,他们其他地方的有些都是秘密的,就打电话给外国人,然后约在哪里,一起走了,谁知道!现在我们东北的,都公开站在大马路上了……(受访者 S01 - C0601)

沈阳留学生 L 就读于巴黎某知名大学的工科,问及“巴黎的东北人”问题,他显得有些尴尬:“这里(巴黎)的东北人很多是做妓女的,我知道,我也不好意思和你多说。因为我也是来自东北的,觉得特别没面子。有什么办法呢?”

作为华人移民群体中一个新的社会类别,“巴黎的东北人”在大众媒体和华人群体等共同力量的作用下被建构起来,他们共同为这种新的社会类别的形成和强化提供话语场域、参与建构过程并传递信息。作为继温州人、潮州人之外的又一个移民显群,“巴黎的东北人”在法国社会被广泛地讨论,使得这种歧视性的社会类别得以延伸、再生产和固化。不过,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被污名化的群体并不总是甘于承受污名化带来的社会歧视和社会隔离,他们也试图挖掘社会公共空间,引发讨论,扭转公众意识,借助公共力量推动歧视的消减和社会接纳。2013年3月16日,美丽城的中国性工作者进行了首次游行,反对制裁性工作者与嫖客的法案。

尽管她们还没搞明白这次游行的口号与诉求,但依然热情高涨。下午两点半,她们聚拢在皮卡勒广场的喷泉前,戴好面具,举起组织者分发的标语牌。据此次游行活动组织者——性工作者协会及“荷花巴士”介绍,这次共有300人注册参加了此次游行。在巴黎的中国人习惯把这些从大陆来的妓女称作“大妈”或是“站街大妈”,这是因为她们大多已过中年,下岗失业后偷渡到法国以卖淫为生。^①

① <http://www.douban.com/note/267564859/>

三、东北新移民:群体身份的建构如何可能

(一)“毛的弃儿,邓的包袱”^①:身份与集体记忆

社会科学界介入对记忆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利克、罗宾斯,2011)。1925年,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用于研究在家庭、宗教群体和社会阶级的环境中,过去是如何被记住的。在哈布瓦赫这里,“集体记忆”一直被认为是形成群体身份的基础,因此,它被看成是一种主要的政治和社会实践(哈布瓦赫,2002)。

有研究者指出,集体记忆越来越成为群体认同研究的一种新的路径,即把集体记忆引入认同的分析中来,把集体记忆视为认同研究的分析工具而不再是一种背景解释的变量(艾娟、汪新建,2011)。关于1949年以来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社会记忆研究,目前较有影响的有孙立平、郭于华及其学生对“土改”口述史的研究,景军关于西北农村政治运动左倾政策所造成的痛苦记忆研究等。这些记忆研究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许多意味深长的转折性事件相联系,从社会学的视野梳理口述记忆可以说完全是一种独特的视角,因为它力求从学理上深度理解那些历史事件(王汉生、刘亚秋,2006)。而在族群研究中,记忆与认同也经常看成是一对有意义的分析路径。台湾历史文化学家王明珂从民族历史与族群本质及其认同的角度,考察了华夏边缘族群的社会记忆的演变机制与该族群的形成与扩张之间的关系,解读历史及其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以及过程机制。王明珂认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从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每种社会群体皆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藉此,群体才得以凝聚和延续(王明珂,2006)。除了在族群研究中探讨集体记忆之外,目前国内的集体记忆研究以“知青群体”最具代表性,在文学、史学、社会学等领域都积累了不少经验研究。刘亚秋立足于“青春无悔”这样一个知青主流记忆模式的建构过程,在“无悔”的取向上对知青的“苦难记忆”展开分析(刘亚秋,2003)。王汉生等指出,知青集体记忆是通过知青个体化的充满张力的叙事而展开其逻辑的,通过叙事,知青“自我”意义和“群体”意义生

^① 此处采用陈意新(1999)对知青一代的提法。

成,在此基础上,知青通过对“代”的认同,使得自己与国家历史相联,以确定自我形象并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定位(王汉生、刘亚秋,2006)。艾娟对知青集体记忆的分析指出,知青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以个体知青的记忆为基础的,需要个体在态度上的肯定支持以及行为上的积极参与。集体记忆会忽略个体记忆的细枝末节与不和谐声音,而个体记忆细枝末节的内容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集体记忆的遗漏起到重要的补充、完善作用。知青共同体和群体认同主要通过集体记忆的激活和维护而不断稳固(艾娟,2006)。

此外,赵云丽(2007)对济南泉城人集体身份的认同研究、刘朝晖(2003)对归侨集体记忆的身份建构分析、梁丽芳(2006)对知青一代私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的阐释等都给笔者诸多启发。

基于上述经验研究,笔者在对东北移民的访谈中,也试图唤起他们对以往历史的记忆,并试图从他们的记忆中解读他们的集体身份。在访谈叙事中,我们多多少少会听到他们对个人经历的回顾以及“毕业分配”、“国有”、“集体”、“工农”这样的话语表述。这些话语涉及到移民表述过去和身份,以及维持他们共有的记忆和身份的方式。

我是71届毕业的,沈阳市三中,就是我们沈阳市女子高等学校。那个时候能考进三中都算不错的学生了。后来毕业分配了,我们那时分配工作是论排的,一排二排,就像你们现在的一班二班。那时我们是四个面向,毕业包分配。我毕业被分配到交通局的下属装卸组。六人一车,两人一组。我们两个女同志一组,把沙包搬到车上,有时不小心把沙包放在车边掉下来,撒了一地,就拿铲子一铲一铲往车上装。我们工作都是有任务的,不是装一车就好了,那个工作真是苦……后来转到冶金下属企业单位,是个集体企业。主要做楼梯防滑条和地板铜条的。(受访者 S01 - C0601)

我是初中毕业分配到农场,我家姐妹一共8个,按照当时两工两农的政策,必须被分配到农场去。我在农场里待了8年,中间读了两年高中,自己外面读的,差不多类似现在的夜大学。79年以后从农场出来回到市区,顶替母亲的工作,进了区房地局,一直做到九几年,单位效益不好。(受访者 S14 - W1303)

从东北移民关于早年的记忆表述中可以推断,他们大都属于出生在50年代的中年劳动力。“知青一代”是国内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以及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潘鸣啸,2010)。有学者从人口学意义出发,将出生在1947-1957年的人口划为“知青一代”(彭希哲、任远,1998);也有学者认为“知青一代”主要包括1947-1959年出生在城镇,并于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的1647多万人(陈意新,1999)。服从分配、下过乡,经历过文革是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以分配为例,分配制度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调配人力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按照当时的情况,各类各级毕业生们无需为找工作发愁,国家会统一安排他们的就业。^①文革时期,城市中学生上山下乡也是由国家统一分配指派(金大陆,2011)。在1960年代末,接受国家分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约构成中国城镇1.2亿人口的13.7%,在上山下乡的12年里(1967-1979年),他们构成约2700多万同年龄城镇学生人口中的61%(陈意新,1999)。

计划经济下的分配制度无疑要求被分配者的绝对服从。但有意思的是,也正是这一代“毛的孩子”(Chan, 1985),如今大步跨出国门,寻找出路。“党和国家”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慢慢退出了权威领域与公共视线。在毛泽东的革命时代,这一代人未满20岁就被过早地驱入社会。在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年代里,这一代的许多人在40多岁时就被迫下岗,过早地退出事业发展的舞台。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所建构的集体身份,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密不可分。

(二)“我们”和“他们”:日常话语与群体边界的建构

话语建构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话语选择而实现的,这种建构形式表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有关群体边界的研究指出,所有的身份认同同时也是差异化的表现,对“他们”群体的社会建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体现群体分异和社会利益冲突的“我们”群体(Fredrik, 1995)。这种群体间的分异也强化了群体之间潜在的,甚至是公开的边界。

在与东北移民的访谈中,“我们”、“他们”这样的话语模式成了表述他们与温州移民之间关系的最基本方式。霍加特(Hoggart, 1957)在研究贫困文化时也提到了“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他看来,大

^① 这项制度开始于1951年,至1999年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消失。

部分受到社会排斥的群体都有很强的内在凝聚力。对大众阶层而言,他者的世界可以用“他们”这个词来表示。

我们毕竟是大城市出来的,素质要高一些……他们温州人都是从田里出来的,我们都是从工厂出来的。(受访者 S02 - Y0601)

我们北方出来的,都是40多岁数了,年纪大。我们这个年纪出来的只能做保姆。他们温州人不一样,有传统的,农村地区小孩子读书读不出就托关系出来了。温州人来这里多少年了呀,据说,他们有些老人连巴黎最早建地铁都看到过的。(受访者 S08 - Z0605)

从东北新移民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自我构筑的与温州移民之间的群体边界:城市/农村、工人/农民。^①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在巴黎华人移民群体中得到了移植与反映,也成为东北新移民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依据。在新移民的各种表述中,“市民与农民”的差异是东北新移民与温州移民之间重要的、本质性的区别之一。“我从城市来”是东北新移民引以为自豪的阶层资本,也是他们表述与温州移民之间差异的重点。即便是目前在温州人家里做保姆、在温州人的作坊里打黑工,东北新移民仍保持着“城市”笼罩下的些许光环,这也成为他们仅有的炫耀资本。而温州移民则通过移民传统的记忆及对侨乡的认同,试图构建“我群”的类属,以区别于新来的东北非法移民,对于后者,他们往往采取群体性的排斥和边缘化。有研究者指出,边界,首先意味着差异(difference)、区隔(distinction)或界限(border)。具体而言,边界是自身与他人或他物得以区分并表明差异的刻度(方文,2011)。透过各种结构性的群体差异表征,我们可以看到,华人移民的群体身份建构逻辑与中国的社会制度有关,或者说是源于中国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即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正是基于这种制度性安排,海外移

①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海外移民中也出现了以投资、技术和留学等为诉求的城市移民群体,但是城乡差异在温州移民中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其原因在于,从数量上来看,温州移民仍以传统侨乡的非法移民为主。据法国内政部官员介绍,在1997年6月开始的第三次合法化运动中,“有1.2万华人提出申请,大约有8000多人获得合法身份,其中90%以上是温州人。还有比这数量更多的没有合法身份的温州人(据法国内政部的估计,大约还有6至8万人)等待着合法化”(王春光、Beja,1999)。

民群体形成自然分割。藉此,新移民主动识别自身和所属的社会阶层,形成“我群”与“他群”之间的符号边界。

四、“东北人”与温州人^①:被结构化的群体性差异

“没有纸张”^②就等于没有身份,这是笔者在调查中听到最多的表述。在巴黎,与“中国人”身份联系最多的是“没有纸张”、“难民”这样的形容。据有关研究,在法国的中国非法移民中,有15-20%是通过人蛇网络非法偷渡过来的,花费1.5-2万欧元;其余80%入境手续合法,只是在签证、居留证过期之后滞留不归,才变成无合法身份者。而在笔者调查的这近20位华人移民中,没有合法身份的几乎占到90%以上。与温州移民的偷渡不同,东北及其他城市新移民迁移法国的路径相对比较直接和简便。他们大部分是通过旅行社或蛇头组织直接或中转某国后再入境法国。据媒体报道,以辽宁抚顺为例,出国咨询服务行业非常火爆。去日本7.8万、韩国7万,手续也很简单,只要交上身份证、户口本、护照,两个月后,就可以商务旅游的名义踏出国门。^③

我付了将近4万块给旅行社办了张旅游签证,我们这些出来的人要么是旅游签证要么是商务考察,据说是考察法国的一种什么糖果……那种糖果中国没有的……所以就借这个名义了。那种旅行社肯定和“上面”有关系的,这就讲不清了。(受访者S01-C0601)

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蛇头。我办的是意大利的签证,比较容

-
- ①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的“温州人”或“温州移民”,主要指来自传统侨乡的移民,如温州、青田(青田原隶属于温州地区)等地。
- ② 在法国,人们习惯于将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称为“没有纸张”sans papier。
- ③ 2001年抚顺取缔19家、限期整改27家出入境中介机构。出国劳务的负面消息,当地媒体时有报道:2001年,抚顺市44名下岗职工,每人交近5万元人民币,被骗到蒙古打工,血本无归;2002年,12名抚顺妇女被高薪工作骗到阿联酋,被迫从事色情服务;2004年,71名怀着韩国淘金梦的抚顺市民被一家中介公司骗取了146万元的中介费;2006年,6名抚顺市民出国打工被骗,在阿联酋沿街乞讨(参见:<http://hi.baidu.com/youguangshuai/item/548528ab40d6cd14a9cfb738>;"东北19名女子梦想嫁老外移民被中介骗87万"[<http://ln.sina.com.cn/news/b/2013-02-28/103530403.html>])。

易,护照签证都是正规的,去签证的时候他陪我一起去的,教好我面试的时候怎么说的,他办的比较正规,宾馆都订好,旅游签证只有一个星期有效。然后从意大利再坐几个小时火车到巴黎。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怕,就怕去不了巴黎。总共花了4万多,算是便宜的,人家十几万的也多的是……(受访者 S14 - W1303)

而温州移民则通常采用偷渡、爬山这些传统的方式。

X,女,35岁,初中毕业,浙江青田人,来法8年。

那个蛇头当初和我说的時候很好的,他说,直接坐飞机过来的,要是中途还让你转火车你就下来直接回去。说得很好听的,我也信以为真。然后我们就去北京办护照,在北京等了两个月。蛇头给我们安排住在北京的一家小旅馆里,30块钱一天。那时我们有20几个,其中和我一起的有12人。因为我走的时候才20多,年纪轻。他们就想帮我们办留学的身份。我们在北京等了两个月办护照,护照拿到后,再以留学生的身份弄俄罗斯的签证。但是签证签不下来,我们就转到丹麦。我们从丹麦坐飞机到了俄罗斯,后来我们就坐车到捷克,下车后我们就开始走路,过河。我们下水过河,谁也不知道河有多深,不过都硬着头皮下去,有个人正好踩在河底的低洼里,差点被水冲走了,还好我在她前面拉住了她,真的很吓人。过了河,我们就越过了捷克边境,进入了奥地利。有个老外司机接我们,带我们从奥地利坐火车到了意大利,在意大利呆了两天。这次接头的蛇头对我们还不错,至少给我们吃东西的。两天后,我们直接从意大利坐火车到了巴黎……我到巴黎的时候,法国都快过年了,已经11月份了。算起来走了差不多将近10个月。那一年是98年,我记得很清楚。(受访者 S10 - X0606)

Y,男,38岁,初中毕业,浙江青田人,来法10年,现在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法国,大儿子13岁,留在老家青田。Y靠流动摊贩营生,妻子没有工作,大女儿上一年级,小的上幼儿园。

我有亲戚在法国,所以后来就想出来了。我们青田那里有很多帮人偷渡的蛇头……亲戚介绍认识了一个蛇头,他就带我偷渡

过来。我们那次一起过来的大概 10 多个人。先是从上海坐飞机到意大利,出中国海关的时候,我们用的是自己的名字,到意大利出海关的时候,蛇头就在别人的护照上贴上我们的照片,就这样混出境了。然后我们从意大利坐火车直接来巴黎。等我们安全到巴黎后,打个电话回国,家里人就付钱给蛇头。蛇头也是青田当地人,所以一家一家都认识的,根本逃不掉的。我记得那个时候一共付了 10 万 5 千。现在早就不是这个价钱了。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钱,一部分是向亲戚朋友借的,还算利息的,1 万 1 年两百块利息,不过来了两三年就差不多还清了。(受访者 S12 - Y0606)

温州人的群体性移民或者偷渡行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笔者接触的范围,温州来的非法移民人数也最多,他们的年纪普遍较轻,受教育程度不高,通常在蛇头的帮助下偷渡进入法国。事实上,温州人长期以来便有移民欧洲的传统。80 年代开始,循着各种网络关系,他们以一传十,相互帮带进入法国谋生。李明欢(2008)把侨乡移民的迁移行为称为“地域移民传统的路径依赖”。法国学者毕卡尔(Picquart, 2004)认为,巴黎中国城的迅速发展,其自主空间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即人际信任和群体计划以及个人成功策略中的网络。图腾式的连带关系、家族、地理方言连接着一种祖先的文化、儒家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金钱上的相互救济。我们也可以看到,温州人移民法国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体经济行为,而是一种群体性或集体性行为。笔者将温州人移民法国看成是他们共同构建的一种跨国的集体性行动。在国内,温州人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区域经济群体。如今,这一群体移植到巴黎。有着移民传统的温州人在巴黎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利益互助团体,他们因血缘和籍贯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对于来自其他地区的华人移民而言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关系和意义。

我是浙江青田人。青田是侨乡啊!青田是个县城,处于温州和丽水之间,以前是属于温州的,人口有 70 万,大概有 40 万在国外,基本上都在欧洲。你如果去青田看,你看到的本地人基本上都是小孩和老人,青年人基本上都出国打工了。久而久之,青田人出国也成了传统。青田是个小地方,要田没田,要海没海的,呆在那里能干什么呢?青田人出来有亲戚朋友帮带的。我 5 岁的时候跟

着舅妈一家一起来巴黎的。我妹妹是近几年通过家庭团聚才过来的。我老公也是浙江青田人,他也是从小和父母、弟弟全家一起移民过来的,好像有22年了。(受访者 S15 - X0606)

相比之下,新近到达巴黎的东北新移民大都来自没有移民传统的城市,他们基本上属于个体移民范畴,在法国社会没有关系网络和相应的社会资本,因此,也缺乏获得各种社会资源的可能性(参见表2)。

我是一个人来这里(巴黎)的。我丈夫身体也不好,脑血栓。我父亲现在79岁了,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我们姐妹几个就我没有小孩。他们都混得不错,不愿出来。(飞机)到了这边(巴黎),他们(蛇头)要我付接机费,那个时候我是带美元出来的,他们要了200美元。然后,就带我到住的地方,就是搭铺,里面住的满满当当,上下铺的,哪里人都有,北方人,天津人……他们也管工作,就是把你介绍给圈子里的人做保姆,然后收钱。刚来那年,我在一家温州人家里做保姆,看小孩,做饭,洗衣服。温州人生了小孩可以在这里扎根,所以他们很能生。大人白天要出去干活,回来的时候就说,“阿姨干这,阿姨干那!”可是来了一年我就病了(脑瘤)。现在我就捡破烂卖,吃难民饭。(受访者 S01 - C0601)

表2 东北新移民与温州移民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东北新移民	温州移民
来源地	东北(黑龙江、辽宁、吉林)、山东等没有移民传统的北方城市	浙江有移民传统的地区(侨乡)
在国内的地位	市民(城市户口)	农民(农业户口)
迁移类型	个体移民	家庭迁移
年龄	40岁以上中年人为主	年轻化趋势、青少年
性别	女性为主	男性为主
教育水平	高中或同等文化	小学、初中文化
出国原因	失业或离婚	家庭团聚
进入法国的方式	持旅游或商务签证直接来法国	偷渡
移民费用	2000 - 5000 欧元	13000 - 22000 欧元

续表 2

	东北新移民	温州移民
负债情况	不到 8000 欧元	10000 - 14000 欧元
在法工作	黑工、保姆	餐馆、服装业
在法网络	没有社交网络	家庭网络

五、结语：转型社会与集体性衰落

群体符号边界的建构,以社会范畴化(包括制度性安排、集体身份、职业等)作为认识基础,在此基础上,“我群”与“他群”通过社会认知、社会比较等社会心理过程或机制得到内化或强化。在各种社会行动中,群体通过集体记忆、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号指称,不断地表征和再生产自身的群体类属和社会表征体系,进一步再生产群体符号边界。东北新移民在法国社会被建构和结构化的过程不仅有赖于法国媒体和公众的推力,也与东北新移民和传统温州移民之间逐渐清晰的群体边界有关。

首先,东北新移民是一个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群体。虽然他们进入法国的方式完全是个体性的,不同于温州人举家迁移的连带方式,但是这一新移民群体有着近似的年龄结构、教育背景、个人经历以及集体记忆,这些无疑强化了他们作为“一代人”的身份认同感。

其次,城市旧中间阶层的衰落是引发东北移民潮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城市中年劳动力为主的东北新移民群体无疑是改革中的失利阶层和失意阶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绝大多数社会阶层成员的整体经济地位都有了较大改善。但是,在总体经济状况不断趋好的情况下,一些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却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出现失利和失意现象(龚维斌,2010)。在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几千万下岗工人正是这一失意阶层的重要代表。他们一度是城市旧中间阶层的主体,如今与大量进城打工者一同构成城市贫困阶层的主要部分。阶层地位的下滑是他们难以承受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中年之痛,也是他们极力寻求翻身的重要动力。

90 年代以来出现的东北新移民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他们的

出现除了个体化的策略与行动机制外,更重要的是来自转型社会内部制度的、体制的、结构性的无形推力,也折射出转型期中国社会中“一代人”的集体焦虑与期盼。

参考文献:

- 艾娟,2006,《知青集体记忆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艾娟、汪新建,2011,《集体记忆——研究群体认同的新路径》,《新疆社会科学》第2期。
- 奥利克,杰弗瑞·乔伊斯·罗宾斯,2011,《社会记忆研究:从“集体记忆”到记忆实践的历史社会学》,周云水编译,《思想战线》第3期。
- 陈意新,1999,《从下放到下岗 1968 - 1998》,《二十一世纪》第56期。
- 杜莉,1998,《法国第一批华人移民》,《法国研究》第2期。
- 方文,2011,《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傅义强,2006,《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研究述评》,《八桂侨刊》第1期。
- 高芸,2004,《中国移民与欧洲的强迫劳动》,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原文见:<http://www.doc88.com/p-04969171448.html>)。
- 龚维斌,2010,《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风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 哈布瓦赫,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金大陆,2011,《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金华,2004,《旅欧华人现状》,《二十一世纪》第7期。
- 李明欢,2002,《欧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 ,2008,《法国的中国新移民人口构成分析——以传统、制度与市场为视角》,《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李强,2004,《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2007,《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梁丽芳,2006,《私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惊和历史反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廖遇常、陈旦生,1991,《法国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的历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3期。
- 刘朝晖,2003,《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松坪归侨社会地位认同的实证剖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
- 刘芳,2002,《东北阻街女进军巴黎之后》,《商务周刊》第18期。
- 刘能,2005,《艾滋病污名和社会歧视:中国乡村社区中两类人群的一个定量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刘亚秋,2003,《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社会学研究》第2期。
- 孟登科、司徒北辰、钱亦楠,2007,《非法移民刘春兰之死》,《南方周末》,12月13日。
- 潘鸣啸,2010,《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 - 1980)》,欧阳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彭希哲、任远,1998,《从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看社会变迁》,《社会学研究》第1期。
- 覃明兴,2005,《移民的身份建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第1期。

- 钱超英,2000,《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 孙立平,2003,《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春光,2000a,《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2000b,《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王春光, Jean Philippe Béja, 1999,《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王汉生、刘亚秋,2006,《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第6期。
- 王明珂,2006,《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维、钱江,2006,《移民网络、社会资源配置与中国东北新移民:美国旧金山湾区田野调查札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
- 文晏,2004,《法国华人社会的变迁》,《海内与海外》第3期。
- 邢树森,1999,《法国华人经济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八桂侨史》第2期。
- 徐华炳,2010,《温州海外移民形态及其演变》,《浙江社会科学》第12期。
- 温特,亚历山大,2008,《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叶星球,1998,《谈法国华人的早期历史》,《欧华侨志》第6期。
- 张秀明,2001,《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也谈新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1期。
- 赵晔琴,2006,《巴黎中国非法移民调查》,《南风窗》第15期。
- ,2007,《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社会》第6期。
- ,2009,“The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Paris: An Empirical Surve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Belleville.”宁越敏主编《中国城市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11,《中西方田野比较的可能性——基于对巴黎美丽城华人移民调查的反思》,陈映芳主编《直面当代城市:问题及方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赵云丽,2007,《符号、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关于济南市泉水记忆的研究》,吉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 Berger, Peter L. & Thomas Luckmann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 Cattelain, C., M. Lieber, C. Saillard et S. Ngugen 2005, “Les déclassés du Nord: une nouvelle migration chinoise en France.”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21(3).
- Chan, Anita 1985, *The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Fabre, Clarisse et Nathalie Guibert 2003, “Une infraction bien difficile à caractériser.” *Le Monde*, le 01 Août.
- Fredrik, Barth 1995, “Les groupes ethniques et leurs frontières.” in Philippe Poutignat, Jocelyne Streiff-Fenart, *Théories de l'ethnicité*. Paris, PUF.
- Gao, Yun & Véronique Poisson 2005, “Le trafic et l'exploitation des immigrants chinois en France.” *Bureau international du Travail Genève*, mars.

- Goffman, Erving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Hoggart, R. 1957, *La Culture du Pauvre: étude sur le style de vie des classes populaires*, 1re éd. Londres.
- Lévy, Florence 2005 "Les femmes du Nord de la Chine, une migration au profil atypique." *Hommes et migrations*, Numéro spécial "Chinois de France", éd. par V. Poisson, n°1254.
- 2012, "The Migration of Women from Northern China: A Gender-oriented Choice?" *China Perspectives* 6.
- Lévy, Florence & Marylène Lieber 2008, "Northern Chinese Women in Paris: The Illegal Immigration-prostitution Nexu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47(4).
- 2011, "La sexualité comme ressource migratoire: le cas des Chinoises du Nord-Est à Paris."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50(4).
- Paul, Marc 2002, "The Dongbei: The New Chinese Immigration in Paris." Pal Nyiri & Igor Saveliev (eds.), *Globalizing Chinese Migration: Trends in Europe and Asia*.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 Picquart, Pierre 2004, *L'Empire chinois: Mieux comprendre le numéro 1 mondial: histoire et actualité de la diaspora chinoise*. France: éditions Favre.
- Somers, Margaret R. & Gloria D. Gibson 1994,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In Craig J. Calhoun (ed.),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U. K., USA: Blackwell.
- Whyte, Martin King 2010, "The Paradoxes of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Whyte, Martin King (ed.), *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Zhao, Ye Qin 2009, "Les illusions perdues d'une Chinoise du Nord à Belleville." *Terrains & Travaux* 16.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罗琳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on human lif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sociology of body. This paper shifts the perspective from modernistic diagnosis of “body in technology” to the idea of “body techniques” in traditional anthropology, discussing how people in modern society make use of their body.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Marcel Mauss, the paper tries to reveal how reflexive body techniques are possibl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discipline, efficiency and ritualiz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uto driving training proces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reflexive body techniques emerge from body interweaved with modern technology, which has the abilities of self-reflective and contains modernistic reflexive of human behavior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This new concept expands Mauss’s classical theory of body techniques, and adds more bright colors to the complete vision of body generation.

An Interdependent Triangle in Social Policy Processes: The case of the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policy *Zhao Mi & Fang Wen* 169

Abstract: The social policy process, to a certain extent, i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interdependence among the policy maker, the policy implementer and the target population. Taking the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polic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behavioral preferences and action strategies of these three interdependent parties by using interview data collected from five villages in Wenzhou area. The authors find that villagers’ citizenship awareness has emerged out of the interdependent processes of the three parties, no matter whether their interdependence is positive or negative. The authors also illustrate the predicament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this process. The triangle model of interdependence proposed by this paper contribute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o studying public policies.

The Logic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Group Differenc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new immigrants in Paris from Northeast China *Zhao Yeqin* 19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ssues on immigrants’ identity have received extensive concern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such as sociology,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 a marginalized group, immigrants’ identity is more salient compared with other groups. Since the late 1990s, the immigrant from Northeast China has become another significant group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France. The immigrants from Northeast China are mainly laid-off workers, and most of them are illegal. Through

examining the immigrants' self-understanding of migration experiences and identit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reveal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duction processes of immigrants' group boundary.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author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collective social anxiety behind China's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late 1990s.

The Impact of Grandchild-caring on Grandparents' Cognitive Functioning in Rural China: A study based on the 2001–2012 longitudinal surveys

..... *Song Lu, Li Liang & Li Shuzhuo* 215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well-being of elderly in Anhui province” survey conducted in 2001, 2003, 2006, 2009 and 2012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grandchild-caring on rural grandparents' cognitive functioning through constructing multi-level growth curv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to low intensity care for grandchildren, high intensity care has protective effect on the grandparents' cognitive aging, however, the effects of high intensity care depend on the age and gender of grandparents. The grandfathers' cognitive aging is protected by the high intensity care for grandchildren, while the cognitive functioning of grandmothers suffers from the high intensity care; and the gender difference tends to be widened with aging. These result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use it or lose it”, and imply the significance of gender role and norm in the Chinese rural families.